

日本愛知大學 黃英哲

眾所周知，作為一門研究領域的「中國學(漢學)」在國際學界已確立穩固的地位，相對於此，作為一門新興研究領域的「台灣學」，在晚近隨著臺灣的民主化與臺灣的自我認識的市民權要求，才日漸受到臺灣內部與國際的重視。就臺灣外部來看，日本學界人士於 1998 年正式成立日本台灣學會，即是一個證明，目前該學會的會員已經超過五百名，從事關於台灣政治、歷史、社會、經濟、人類學、文學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相對於目前的榮景，戰後台灣的台灣研究，卻有一段長期被壓抑的時期，一般的看法是，一直到 60 年代時仍未受到重視，直至 70 年代才開始起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到戰後 70 年代為止，台灣研究在台灣雖然受到壓抑但並未完全中斷，守住這絲研究命脈的有：台灣文化協進會《台灣文化》(1946 年~50 年)、《公論報》副刊「台灣風土」(1948 年~55 年)及台灣風物社(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台灣風物》(1950 年~現在)這三個刊物及其作者群。然而，在戰後台灣之台灣研究的草創期間，持續台灣研究的僅只有民間團體的「台灣學」嗎？究竟戰後台灣之台灣研究是如何展開？曾經被制度化成為一種官方支持的「台灣學」嗎？而如果有的話，這樣的制度化的官方台灣研究機構之濫觴為何？又是在何種歷史的機緣與脈絡之下登場的呢？在「台灣學」成為「顯學」的今天，上述的問題必須作一徹底的釐清，藉以開展更為健全的台灣研究。

戰前，帝國日本在亞洲，包括殖民地台灣的調查研究活動，按其目的與屬性可大致分為六類。1、文獻調查・資料收集。2、物產・軍事要地調查。3、舊慣・習俗調查(包含民族調查)。4、市場・經濟情形調查。5、經濟計畫立案調查。6、華僑・華人調查。因為有上述的調查活動，當日本戰敗時，已累積相當龐大數量的研究成果。

1945 年 10 月，陳儀接收台灣後，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台灣文化重建政策。包括陳儀在內，戰後初期陳儀政府時代在台灣從事教育、文化工作的大陸來台官員、學者，以「知日派」佔多數，因而較能理解日本遺留的台灣研究之文獻資料與研究成果在學術文化上的價值。當時，擔任台灣文化重建

機構之一的台灣省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也大聲疾呼對於日本所遺留下具有學術性的研究應該接收，並將之編譯成中文，意圖作知識的再生產，使其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一部分。換言之，將日人的學術文化研究「中國化」的挪用策略。為此，許壽裳在台灣省編譯館設台灣研究組，並任命台灣出身，活躍於戰前及戰後初期對台灣文、史方面頗有研究的楊雲萍擔任研究組主任。

台灣研究組主要工作是接收，甚至也可說是繼承戰前日本人留下的台灣調查文獻資料與台灣研究，在楊雲萍的推薦下，台灣研究組留用了一批日本學者。從台灣研究組的工作內容與工作成果看來，除了作史前史跡發掘，也進行田野調查、文獻資料鈔錄、復刻、編譯，其研究範圍囊括今天所稱的「台灣學」、「台灣研究」，它同時也是戰後台灣，作為政府機構的台灣研究—「台灣學」之出發點。台灣研究組主要成員的楊雲萍、國分直一、池田敏雄、立石鐵臣皆是戰前《民俗台灣》的同仁，同時也是至 70 年代為止維繫戰後台灣研究命脈的重要民間刊物《台灣文化》、《公論報》副刊「台灣風土」、《台灣風物》一的重要執筆者。

台灣省編譯館撤廢後，台灣研究組的主要工作內容由台灣省通志館繼承，50 年代以後，國分直一在台北師範學校時代的學生王世慶，任職於台灣省通志館→台灣省文獻會，繼承師學為台灣文獻的保存研究貢獻良多。至於台灣研究組的日本工作人員，除了國分直一、立石鐵臣到 1949 年為止轉任台灣大學歷史系民族學研究室外，其餘則在 1947 年遣返日本，1949 年，國分、立石及台灣大學歷史系民族學研究室另一留用日本學者宮本延人返國後，其研究工作則由台灣出身的陳紹馨、陳奇祿、宋文薰繼承。而台灣研究組主任楊雲萍則轉任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擔任南明史與台灣史的教學，至 1977 年退休為止。從戰前到戰後，臺灣的臺灣研究在知識生產上，在制度的與人員的方面，就是以這種微妙的方式，在斷裂中的繼承與展開。

個人認為有必要再度仔細釐清作為戰後最初之官方的台灣研究機構的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研究組，以及以其為核心的戰後初期台灣之台灣研究之展開，從史學史、學術史的角度重新思考戰前的知識繼承與戰後台灣之台灣研究的脈絡。